

明代世界格局的变迁

□ 李大伟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称帝，建立明朝（1368—1644年），凡十六帝，享国276年。在这两百余年间，世界格局逐渐嬗变，尤其是西方的兴起与扩张改变了传统欧亚大陆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明代以东亚为核心建立的朝贡体系式微，不断被西方殖民体系所消解，朝贡体系向殖民体系的演变成为此时世界格局的主要变化。

明代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即指以中国中原帝国为核心所形成的等级政治秩序，主要存在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与中亚等地区。在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通过对周边诸国册封等形式，获得诸国对其共主地位的承认。中原政权作为最高政治中心，各朝贡国构成外藩、臣属于中原政权，更多体现为一种宗藩关系，而非武力征服，而且中原政权通常奉行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尤其在朝贡贸易中更是如此。

洪武二年（1371），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即将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谥亨国（马来半岛地区）、白花国（苏门答腊西北）、三弗齐（苏门答腊巨港）与渤泥国（今文莱）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告诫后世“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以怀柔远人。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时期，将蒙古势力驱逐出漠南之外，北方外患解除之后，先后派遣郑和在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抚驭万国。郑和下西洋一个最大的目的即通过向海外炫耀中原王朝的富强、兵力，宣扬明朝的威德与明成祖的威望，以招徕海外诸国称臣纳贡，建立朝贡体系。郑和所到之处便向诸国宣明明朝皇帝为天命之君，四方藩夷当遵照其旨意，共享天下太平等等。在郑和感召之下，海外万国纷纷前来朝贡，明朝的朝贡体系也达到了顶峰。

明朝通过朝贡体系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中亚等地建立了一套以明廷为核心、四方藩夷拱卫与朝贡的政治秩序，的确一度在海内外彰显了明廷的影响力，但是伴随这个体系所产生的朝贡贸易却是不对等的，海外诸国为获取更多赏赐亦尤喜朝贡。

西方扩张与殖民

15世纪以来，由于西方航海技术的进步，西方人力求寻找直通东方的海路，打破穆斯林对丝绸之路的控制，获取梦寐以求的丝绸与香料等东方物资。因此当郑和下西洋

之时，最早以亨利王子（1394—1460年）为代表的葡萄牙人开始了向东方的海路探索。亨利王子立航海学校、奖励航海事业。在他的支持下，葡萄牙船队1434年越过西非博哈多尔角（CapeBojador），于1448年在北纬20度阿奎姆岛（Arguin）建立欧洲人在西非第一个殖民据点，以用武力取得了撒哈拉地区控制权，并在非洲西海岸一带进行黄金与奴隶贸易。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继续探索海路，发现了著名的好望角；1498年，另外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69—1524年）越过好望角继续向东行驶最终发现了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印度，打通了通往东方的航线。

葡萄牙人在到达印度之后，意大利人哥伦布根据“地圆说”的判断，相信向西航行可以寻找到另外一条到达印度的航线。为了打破葡萄牙对东方航线的垄断，西班牙支持哥伦布的航行，并设想找到这条海路。1492年在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下，哥伦布（1450—1506年）向西航行经过大西洋却意外地发现了新的美洲大陆；1519—1521年，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年）率领的船队最终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至此整个世界被发现。这场由葡萄牙与西班牙向海外探索设法发现印度之举，导致了全球性联系的建立，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阶段。

在葡萄牙与西班牙新航路发现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的是他们的殖民贸易活动。早在1415年，葡萄牙人便占领了北非城市休达，1448年占领阿奎姆岛，又对亚速尔群岛、马德拉展开殖民活动，在西非加纳建立贸易要塞，在东非则占领了莫桑比克、蒙巴萨；1506年占领了印度洋索科特拉岛，1509年在第乌海战中战胜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印度洋真正的霸主，并于1553年占据澳门。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各地建立殖民统治之后，通过“贸易商站”的形式控制商路，葡萄牙人的商站从西非一直延伸至中国澳门与日本长崎，并凭借军事优势建立海上霸权，以此控制了印度洋贸易。继葡萄牙人之后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17世纪之后荷兰与英国海上力量日益强大，通过各种形式夺取了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商站，并建立了各自的商站体系。荷兰与英国通过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形式经营垄断、走私贸易，甚至殖民活动，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

西班牙在到达美洲之后主要以战争形式打败了美洲印第安人政权，建立了殖民统治，并于1565年占领菲律宾，开通了从墨西哥至菲律宾的航线，实现了美洲与东方的海路联系。欧洲人在美洲广泛建立种植园，通过从非洲贩卖奴隶，在欧洲、非洲与美洲之间进行三角贸易活动，并以菲律宾为据点用马尼拉大帆船从事白银贸易，将美洲的白银运到东方，再将东方的物资运到美洲，实现了全球性的贸易联系。

从朝贡到殖民

15世纪以来，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尤其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的经略使得明廷自郑和之后确立的朝贡体系逐渐消解。17世纪继葡萄牙之后兴起的荷兰与英国，更是通过殖民体系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日益严密，取代中国的朝贡体系。围绕朝贡体系所形成的朝贡贸易，也让位于殖民贸易与垄断贸易，传统丝绸之路贸易让位于西方的全球性贸易联通。在这个国际格局嬗变中，明廷的朝贡体系所代表的注重宗藩关系、怀柔远人与厚往薄来的国际秩序主张，被西方所奉行的武力征服、殖民统治与垄断贸易所取代。

时人利玛窦中西贯通、知晓当时中西方的差异，对此有着精辟的概括，称中国人拥有精良的部队，但不曾考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欧洲人只知对外扩张，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不屑向外国学习，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利玛窦精辟地概括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对外政策的差异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乃至国人天朝上国的心态与对世界的无知。

我国古代社会矛盾突出时期的吏治

□ 卜宪群

社会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统治者如处理得当，会化解矛盾，转危为安；如处理不当，也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危机。面对突出社会矛盾，统治者的吏治状况与吏治手段如何，在缓和社会矛盾或激化社会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

我国古代社会矛盾凸显的主要原因

政策法令制定不当。一般来说，王朝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如果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政策法令得当，国家很快就能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后几十年，随着功臣元老凋落，官吏新陈代谢加速，如又能适时调整统治思想，改变治理策略、用人策略，又可以渡过各种矛盾突出的危机，使王朝能较长延续，汉、唐、明、清都是案例。反之则会激化矛盾导致王朝覆没。秦初即推行沉重的赋税徭役政策和严酷的法律，是陈胜吴广在秦朝建立十余年后即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东汉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起源于乡里两股势力的一次争论，但在舆论的推动下争论流向洛阳太学，由局部突发事件形成全国性社会危机。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基于东汉王朝对整个形势判断错误，制定政策失误，致使朝廷几乎与整个社会直接对冲冲突。历代中原王朝大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存，一旦政策失误引起民族冲突，也会激化社会矛盾。

横征暴敛引发农民起义。获得天下后如不能及时恢复经济与民休息，仍然赋税徭役沉重，就会积累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历代农民身上的负担主要是赋税、人头税和徭役。唐中叶以前，我国封建社会矛盾激化所引发的农民起义，主要针对国家经济暴政，矛头直指官府。中唐以后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朴素的平均平等思想更为明确，争取自身经济地位的要求更为强烈。农民战争的主要对手虽仍是封建王朝官府，但封建财产关系和地主阶级所受到的冲击，远比先前激烈得多。

（上接1版头条）

农村公路有力支撑“脱贫致富”，有效促进乡村振兴。五年来，我们重点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累计投入3257亿元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约783万公里，实施安全防护工程约282万公里，加宽窄路基路面公路约104万公里，建成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约46万公里。支持贫困地区新增约780个乡镇、465万个建制村、22万个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推动实施“农村公路+”旅游、产业、扶贫等发展新方式，有效盘活了地区资源，带动了特色种养业、农村电商、客货运输、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有效增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在过去五年的发展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公路发展道路。经验弥足珍贵，必须长期坚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好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在各自领域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坚持建设人民满意交通，坚持农村公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把“四好农村路”建成广大农民的致富路、小康路、幸福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把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落实好县级人民政府主体责任，整合好资源，统筹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必须

（上接1版二条）

这种自觉源于斗争的精神。要秉承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进一步涵养政治定力，炼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在党领导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始终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坚决落实好“两个维护”。

社会矛盾突出与吏治的关系

用人不当，加剧矛盾激化。秦二世昏庸，重用赵高，“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使秦始皇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东汉中期皇权衰弱，外戚宦官专权，政治全面黑暗，士大夫没有出路，人民负担沉重，正常社会秩序严重破坏。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皇权面临严重危机，而腐败无能的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晚明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用人不当还表现在当时统治者不能知人善任，不能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位置上。

官僚队伍腐败。古代官僚队伍腐败是常见现象，其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是一个过程。《太公阴符》一书中托周武王问姜太公“治乱之要”，姜太公列举了十种情况：吏做事苛刻；吏不公平；吏贪污腐败；吏以权力胁迫民；官与吏合伙做坏事；吏缺乏人情；吏监守自盗；吏经商贱买贵卖给民；吏把负担转嫁给民；吏对民声色严厉。这十种腐败中如有三种情况，就会“国乱而民愁”，如果“尽有之，则民流亡而君失其国”。这基本上概括了官僚腐败的状况与结局。这种腐败如果与某种突发事件相关联，就会使社会矛盾激化加剧。

缓和社会矛盾的吏治手段

知人善任，用人所长。知人善任，用人所长是统治者化解局部社会矛盾的常用手法，效果也很明显。汉代薛宣善于理政，史称他“白黑分明”“政教大行”。任临淮太守期间，陈留郡社会矛盾激化，汉成帝将其调往陈留，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很快被平复，原因是老百姓“敬其威信”。薛宣后任左冯翊，其管辖范围内频阳县矛盾突出，难治，栗邑县民风淳朴，易治，但频阳县令是因“孝”被选拔出来的，凭资历而升迁，缺乏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的方法。栗邑县令尹赏出身郡吏，善于理事。薛宣上报批准后将两县令互换，数月后“两县皆

坚持建管养运协调发展，奋力解决由“通”到“畅”，再到“好”的问题。努力实现系统最优。必须坚持融合发展，把“四好农村路”主动融入到农村地区的产业、物流、环境、特色经济的大生态体系中，形成整体合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以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方法创新激发农村公路发展新活力。

大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公路发展的主攻方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总目标，深化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以实施补短板、促发展、助增收、提服务、强管养、重示范、夯基础、保安全“八大工程”为重点，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四好农村路”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真

当坚决落实好“两个维护”。

“两个维护”是刚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高政治原则、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旗帜鲜明地拥护、坚决有力地维护。“令不行，禁不止，与无官无政同”。我

治”。无论制度如何，官吏的个性差别始终存在，有的善于“破坚理烦”，有的较为因循；有的注重道德感化，有的唯法至上。官吏个人为政风格不同，各有优劣，根据不同情况调节使用，对区域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有益。针对不同的社会矛盾选派不同的官吏去处理，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但主要取决于用人者的识见，也取决于整个政治环境的优劣。

调整结构，缓和矛盾。对于全局性的社会矛盾，需要统治者从宏观角度调整吏治。汉初官僚队伍结构仍以秦代文法吏为主体，以法家为指导，为政严酷，社会矛盾再度突出。萧何、曹参等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选用“谄于文辞，谨厚长者”为吏，对“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作用。汉武帝时又吸收儒学之士参政，不仅强调以法治国，而且强调以德治国，大量选拔在基层社会道德声誉良好的人为官吏，使政风得以部分改观，矛盾有所缓和。东汉初年，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避免功臣占据行政岗位，重用儒学之士，使东汉初年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我国历史上官吏选拔制度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调整官僚队伍结构的重大举措。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物参与国家管理，是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

实施改革，起用人才。改革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常用方法，成功与否，均与统治者用人关系极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改革用人不受资历、年龄、秩别限制，能够破格选拔杰出人才来处理复杂的社会事务。战国是社会矛盾激化时期，也是破格用人的主要时期，列国主持变法人物大都来自它国，国君看重的只是其政治主张和能力。秦汉之际社会矛盾复杂，刘邦知人善任、任人唯能，是他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获胜的重要原因。汉魏之际的曹操，用人“各因其器”“不念旧恶”，唯才是举，网罗了大批人才。当然，破格起用是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位置上，也不宜泛用。

善用勤能，化解矛盾。历代王朝多重视从基层选用官吏，从郡县选用官吏，朝官更需有地方为政经历。汉代选拔人才，很注重乡里的评价，因为乡里是一个人生长的地方，其评价有一定的准确性。“乡论”好不好，其人很难为官。乡里有较高道德威望的吏员，一般出自本地，尽管他们级别不

正学懂弄通做实。把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

认真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加快推动农村公路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完善法规政策保障体系，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修订，加快《农村公路条例》出台。完善组织保障体系，大力推行“路长制”，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指导、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完善技术指导体系，大力推广低成本、操作简单的标准化养护技术。完善统计、监测、绩效考核体系，继续推进“四好农村路”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着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目标，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四好农村路”发展。要推动创新发展，积极推动出台《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推动协调发展，着力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完善美丽农村路指标体系。推动开放发展，着力推动农村公路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共享发展，着力推进城乡交通一体化，有序推动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向城市周边延伸，鼓励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

抓住用好乡村振兴战略新机遇，全力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当好先行。要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力确保

高，但也拥有上升通道。汉代宋吕原本是乡官，后升任大司农（位列九卿）。他为人廉洁公正，从不粗暴无礼对待别人，经常抚恤慰问老人和孤寡无依的人，深得吏民敬爱，自然也化解了不少社会矛盾。为化解矛盾，朝廷也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官吏在复杂时期勤勉工作，如增秩、赐爵，给予其更高的待遇。而对处理不好事务的官员，则采取降低秩次、调离等措施。

“久任”与“便宜从事”。对那些善于处理复杂社会矛盾、深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吏，国家不轻易调动，让他们“久任”。明代宣德年间，苏州、吉安等九府难治，朝廷一次性从各部员外郎中选9位任知府职，给予他们特殊权力。其中况钟任苏州知府13年，陈本深任吉安知府18年，治绩突出。晚明学者韩邦奇说：“官不久任，虽欲言治，皆苟而已。百弊皆生于不久任，百利皆生于久任。”此言虽绝对，但不无借鉴。“便宜从事”是古代官吏在遇到应急事务或突发事件时，可以不拘条规，无须请示处理。汉宣帝时渤海郡大乱，龚遂出任太守，他向宣帝请示：“臣闻治乱民犹治乱贼，不可急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在特定时期给特定的地方官吏相对自主的权限，对及时处理问题有益，也是古代国家处理社会矛盾激化的有效办法之一。

严厉惩处腐败官吏。为防止社会矛盾扩大，历代统治者很注重对腐败官吏的惩治。在社会矛盾激化时期，惩治腐败的力度大，可以平息民怨，昭示公正。东汉初年国家为增加收入而“度田”，有的官吏不敢得罪权贵，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引起农民的反抗。光武帝知悉度田不实的情况下，对舞弊官吏进行严厉惩罚，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等人，皆下狱处死，使民怨得到暂时缓解。用人失察，即被任用者出现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的行为，用人者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即使非其所举，如果辖下腐败，监察官也要受牵连。汉代规定：“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罪为罪。”



完成“到2019年底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到2020年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两个指标。要做好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确保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保持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和政策强度。着力发挥好“四好农村路”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支撑保障作用。

肩负起建设交通强国的新使命，以高质量的“四好农村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建设交通强国，不能有“乡村”短板。要加强谋划研究，把“四好农村路”作为《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要加速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稳步扩大农村公路网络覆盖程度，积极推进农村公路联网成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交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新时代实现新担当新作为。“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是干出来的。要坚持党对农村交通的领导，发挥好党组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要坚持建设人民满意交通，进一步在基层凝聚民心。要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共同参与，坚持改革创新，实打实、硬碰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崇尚实干、埋头苦干，努力干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又让自己追悔莫及。一般化地落实“两个维护”，就容易导致选择性维护、庸俗性维护，时间一长就会使纲纪废弛、精神懈怠、“四风”回潮。必须发扬纪律严明的传统，弘扬“三严三实”的作风，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两个维护”，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是要听从党中央号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